



# 敝帚自珍

陳正茂教授論文自選集

· 陳正茂 著

# 敝帚自珍

陳正茂教授論文自選集

· 陳正茂 著

敝帚自珍：陳正茂教授論文自選集 / 陳正茂著。  
-- 一版 -- 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 2009.08  
面；公分。--(史地傳記類 ; AC0010)  
BOD 版  
ISBN 978-986-221-260-8(平裝)

1.中國史 2.近代史 3.現代史 4.臺灣史 5.文集

627.07

98011664



史地傳記類 AC0010

## 敝帚自珍——陳正茂教授論文自選集

作 者 / 陳正茂  
主 編 / 蔡登山  
發 行 人 / 宋政坤  
執行編輯 / 詹靚秋  
圖文排版 / 姚宜婷  
封面設計 / 陳佩蓉  
數位轉譯 / 徐真玉 沈裕閔  
圖書銷售 / 林怡君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出版印製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583 巷 25 號 1 樓  
電話 : 02-2657-9211 傳真 : 02-2657-9106  
E-mail : service@showwe.com.tw  
經 銷 商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電話 : 02-2795-3656 傳真 : 02-2795-4100  
<http://www.e-redant.com>

2009 年 8 月 BOD 一版  
定價 : 400 元

• 請尊重著作權 •

# 自序

人到中年，特別喜歡憶往，這種念舊、懷舊之情，或許是開始步入老境的徵兆。近年來常喜歡把一個人關在書房裡，聽老歌、喝咖啡、遠眺窗外山，隨覽舊時書；興之所至，甚至看看昔日相片，翻箱倒櫃欣賞起以前青澀歲月捎給老婆的情書，或是在午夜孤燈下疾寫的日記，當然還有自己悠遊史海二十餘載的舊文殘篇。檢拾這些已略帶久遠的論文，才猛然醒悟，時光飛逝如電，昔時青青子衿的豪情不再，如今只剩下滄桑中年，「過河卒子」般的無奈心境，歲月真是不饒人呀！

昔梁任公在《清議報》發行百冊祝辭說：「雖然葑菲不棄，敝帚自珍，嘵舌瘖口，亦已三年。」這些近二十年來，陸陸續續撰寫的論文，實為自己過往浸潤近、現代史，一路孜矻研究的印記。雖非藏諸名山之作，然對己而言，不無敝帚自珍之價值。是以，承登山兄不棄，屢次鼓勵弟多寫多出書，今將此論文集結成冊，除再次感謝登山兄的厚意外，也為自己浮生虛度五十，聊作一個紀念。

陳正茂序於士林

98年6月

# 目次

自序 .....	i
壹、馮桂芬之生平及其變法思想初探 .....	1
貳、廣州軍政府與國會之研究（1917～1920） .....	31
參、淺論太平天國的科舉制度 .....	61
肆、少年中國學會與收回教育權運動 .....	81
伍、少年中國學會與反宗教運動 .....	107
陸、清太祖建儲考 .....	131
柒、明末澎湖群島海防地位之探討 .....	143
捌、中法戰爭與澎湖海防 .....	179
玖、解嚴以來臺灣文學史論述的統獨大戰——陳芳明 vs 陳映真 ....	203
拾、第三勢力在兩岸交流之角色分析 .....	219
拾壹、同為「北大人」——記胡適與李璜的情誼 .....	237
拾貳、中國青年黨史料研究——以期刊為研究場域 .....	251

# 壹、馮桂芬之生平及其變法思想初探

## 一、前言

晚清的變法運動，約而言之，大致可分為四期：鴉片戰爭後的海防運動、英法聯軍後之洋務運動、甲午戰爭後之維新思想、以及八國聯軍後之改革與立憲。<sup>1</sup>每一次對外戰爭失利，所換來的慘痛經驗，就是錐心刺骨的省思與新的變法方案，目的就是希望如何使中國能適應於現代世界。而這些動機的發展取向，誠如金耀基所言，宜從「自上而向下落」、「由下而向上逼」、「自內發出」與「自外逼入」四個方向同時分析。<sup>2</sup>比照整個晚清的局勢，它的發展和推動的誘因，似乎是如此。

當然，促進中國的現代化，這條路子是坎坷的，歷程是艱辛的。大凡一種思想，有贊成者，必有反對者。這種現象在晚清更是明顯。全漢昇在〈清末反對西化的言論〉一文中，有很清楚的分析。<sup>3</sup>吾人以為無須去苛責這些守舊衛道份子，因為這是任何一個傳統社會，要步入現代化社會前必有的「陣痛期」。換言之，這些贊成與反對的思想潮流，是自然發展動向的寫照。賀昌群曾說：「一個時代，一時文化思想之盛衰，隱隱乎如百川匯海，時或波濤澎湃，時或淵綜渟汪，皆有不得不然之勢。所謂『承百代之流，

<sup>1</sup> 李守孔，〈晚清知識份子與救國運動〉，《史學論集》（三）。

<sup>2</sup> 金耀基，〈中國現代化與知識份子〉（臺北：時報版），頁 21。

<sup>3</sup> 全漢昇，〈清末反對西化的言論〉，《嶺南學報》第 5 卷第 3、4 期合刊，頁 122-166。

而會乎當今之變』者也。」<sup>4</sup>對晚清思潮的動向，這無疑是個很好的詮釋。

論晚清知識份子的變法思想，其最大的困惑與問題在何處呢？王爾敏曾歸納出幾項：「其一，即中西新舊之觀念，不但不易相容，而且駁雜萬端。其二，西方制度習慣，在適應上有不少困難，至少亦有程度上之差別。其三，西方制度同樣是隨時變化，頗苦於追逐模仿。其四，西方制度未必是盡善盡美。」<sup>5</sup>細思王氏的看法，實際上就是晚清變法和反變法所爭論不休的課題。但是儘管如此，現代化這條路勢必非走下去不可，在「中國現代化的發展中，我們看到『認同』的逐步減弱，與『變革』的逐步擴大。」<sup>6</sup>

這「認同」就是對傳統認同的逐漸疏離，而「變革」乃是因應現代化要求的漸次增強。這種明顯的變化，在晚清的知識份子中，以馮桂芬最具代表性。因為他是一個以「經宗漢儒，亦不廢宋」<sup>7</sup>的傳統儒生，而思「更張法制」<sup>8</sup>並「隱然有撥亂澄清之志」的人。<sup>9</sup>其所代表的是儒家經世思想在現代化過程中的意義，同時也象徵傳統知識份子在過去與現代衝突中所具的悲劇精神。<sup>10</sup>由於馮氏具備了這些特色，所以研究他實頗具歷史意義，本文之作，動機即是如此。

近人研究馮氏者並不多，早期有黃淬伯的〈七十年前之維新人物馮景亭〉、周輔成的〈馮桂芬的思想〉；與日本百賴弘之〈馮桂芬及其著述〉。較晚的有呂實強的〈馮桂芬的政治思想〉、林立樹的〈一百年

<sup>4</sup> 賀昌群，《魏晉清談思想初論》（臺北：九思版），頁 54。

<sup>5</sup> 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潮之動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3 期。  
<sup>6</sup> 同註 2，頁 25。

<sup>7</sup>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頁 564。

<sup>8</sup> 《近代名人小傳》（臺北：文海版），頁 28。

<sup>9</sup> 徐世昌，〈校邠學案〉，《清儒學案》卷 173（臺北：世界版）。

<sup>10</sup> 吳雲，〈雨壘軒尺牘〉卷 2（臺北：文海版），頁 90-122。

前的維新人物馮桂芬〉；以及陳孟忠的臺大碩士論文〈馮桂芬維新思想之研究〉等。至於一般性的政治思想史，評論較多的有蕭公權的《中國政治思想史》、日人小野川秀美的《清末政治思想研究》，和呂實強為商務印書館所編的《中國歷代思想家》(42) 等三書。而拙文主要是以「變法」的視角，來觀察闡述馮桂芬之思想，希望由此一角度的探討，能對馮桂芬的思想，有另一層次的瞭解。

## 二、馮桂芬之生平簡介

馮桂芬，字林一，號景亭，或作景庭，又號鄧蔚山人，<sup>11</sup>江蘇吳縣人（蘇州）。生於嘉慶 14 年（1809），卒於同治 13 年（1874），享年 66 歲。據馮氏自述，其先世在元朝時由湖南遷來蘇州，元末於兵燹中失其譜系，故其始末不可考。十世祖馮寬富，為明中葉人，籍屬常熟營兵，納貲捐百戶，家於任所，是以一說馮氏為常熟人。<sup>12</sup> 寬富次子為馮惠始，因出嗣，家於蘇州，富於貨，恭儉正直，頗為鄉里所重。是後數百年間，久為素封，未或衰微，八傳而至桂芬之父——馮智懋（字明揚，號春圃：1770～1850），經營商業，家道頗殷。<sup>13</sup> 其後於道光 6 年及 9 年，因連遭火災，損失慘重，然仍有田產十頃，可謂小康之家。

桂芬幼時，亦依習俗就師學制藝時文，道光 8 年，年 20，進秀才，頗得江蘇學政辛從益之知遇。<sup>14</sup><sup>23</sup> 歲娶黃氏，翌年（道光 12 年），江南鄉試中舉人，其才識極為江蘇巡撫林則徐所讚賞。<sup>15</sup> 是後

<sup>11</sup> 《清代七百名人傳》第四編，學術、藝事、馮桂芬（臺北：文海版），頁 1732。

<sup>12</sup> 馮桂芬，《顯志堂稿》卷 8。

<sup>13</sup> 百賴弘，〈馮桂芬及其著述〉，《中和月刊》3 卷 3 期。

<sup>14</sup> 馮桂芬，〈邵步青醫學三書序〉，《顯志堂稿》卷 3。

<sup>15</sup> 馮桂芬，〈林少穆督部師小像題辭〉，《顯志堂稿》卷 12。

屢次會試不中，直到道光 21 年會試，才以一甲第 2 名（即榜眼）中進士，入翰林院任編修，時年為 32 歲。<sup>16</sup>以當時一般參加考試的士子而言，桂芬科場還算順利，但其後宦場卻不甚得意。

先是桂芬在中進士以前，其文章聲名早已聞及鄉間，深得當時撫蘇之林則徐所賞識，乃力邀其入撫署，校《北直水利書》，而其本身也參與實際政治工作，和當時的督撫名儒相交甚洽。據《吳縣志》記載：「林文忠撫蘇，目桂芬國士，文忠輯西北水利說，桂芬與編校，歷參陶文毅，裕靖節幕府，遂經世學。」<sup>17</sup>嗣復先後入兩江總督陶澍、江蘇布政使裕謙幕府，對陶、裕二公整頓江蘇水利，改革淮北鹽法及海運之實施，貢獻至大。

桂芬聲望卓著，誠如李鴻章所言：「自未仕時，已名重大江南北」。<sup>18</sup>惟桂芬自中鄉試後，游幕數年，參與行政實務，這一段經驗對桂芬的經世實用之學，有很大的助益。其後為準備會試，於道光 17、8 年間，入蘇州「正誼書院」攻讀，師事進士出身，曾任翰林院侍講之朱珔。<sup>19</sup>道光 20 年，入京會試，以一甲第 2 名進士及第，授職翰林院編修，考官有同鄉先輩潘世恩。<sup>20</sup>嗣後五年間，據〈疇人傳〉所載：「嘗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廣西鄉試正考官、教習庶吉士」等差事。<sup>21</sup>

參與考試及編纂實錄，這些差事，均是名尊而無實，閑散之官也，對於一個充滿經國濟世的馮桂芬，無疑是有志難伸。道光 25 年，丁母憂，次年扶櫬回蘇州，服喪於家。迨道光 28 年，守孝期滿，因

<sup>16</sup> 王壽南主編，《中國歷代思想家》(42) (臺北：商務版)，頁 4885。

<sup>17</sup> 《吳縣志》卷 66，〈列傳四〉，頁 1202。

<sup>18</sup> 李鴻章，〈墓志銘〉，《顯志堂稿》，頁 28。

<sup>19</sup> 馮桂芬，〈洪銘之時文序〉，《顯志堂稿》卷 2。

<sup>20</sup> 《宣宗實錄》卷 333-334。

<sup>21</sup> 諸可寶等編，《疇人傳》3 編卷 5，〈馮桂芬〉(臺北：世界版)，頁 806。

父年事已高，不欲遠行，乃應兩江總督李星沅之聘，主講於江寧「惜陰書院」，直至年底。<sup>22</sup>次年，在其父力促下，返回北京，仍供職翰林院。在京期間，雖一直位居閒曹，但卻有時間和機會閱讀了翰林院國史館所收藏的豐富文獻典籍，並與陳慶鏞、姚瑩、趙振祥、曹懋堅、張穆等當時宏學碩儒講求經世之學，良師益友，對桂芬日後立身處世，思想發展，有著相當大的影響。<sup>23</sup>

道光 30 年，宣宗駕崩，文宗即位，詔舉賢才，大學士潘世恩上疏推薦林則徐、姚瑩、邵懿辰和桂芬四人。文宗即予召見，正擬有所用，又以父逝而服喪歸里。家居期間，曾應兩江總督陸建瀛之聘，赴揚州主持〈鹽法志〉的編纂。<sup>24</sup>咸豐 3 年，桂芬鄉居後，適值太平軍進窺蘇州，向榮統官軍擔任防禦。時桂芬本應晉京供職，但因官軍副帥蘇撫許乃釗之請，乃留蘇州，幫忙辦理團練。《清史》列傳云：「咸豐三年，粵匪陷金陵，奉旨與程廷桂、韓崇、胡清綏，同辦團練，勸捐事，巡撫許乃釗，駐金陵，羽檄日數至，商略裁復，皆桂芬主之。」<sup>25</sup>

此時桂芬鑒於鄉兵弱而無力，乃與鄉紳馬釗、劉存厚、程庭遠等商議，週轉資金，雇傭兵千餘名，自成一隊，號為撫勇。在劉存厚的指揮下，並得許乃釗，及其後任吉爾杭阿之援助下，戰績卓著，尤其在進擊上海附近各州縣的小刀會諸役中，表現更佳。<sup>26</sup>此外，桂芬更積極的參與均賦工作，此乃因蘇州長久以來，賦稅不均所致。蘇州大地主極多，官商勾結的關係，官府對此等大地主所課之田賦，反較小自耕農為低，以致田賦收入，因之減少。此問題由來已久，

<sup>22</sup> 馮桂芬，〈惜陰書院戊申課芸序〉、〈青山館制序〉，《顯志堂稿》卷 2。

<sup>23</sup> 《清史列傳》〈文苑傳四——馮桂芬〉卷 73（臺北：中華版），頁 943。

<sup>24</sup> 同上註，及同註 16，頁 4886。

<sup>25</sup> 同註 23。

<sup>26</sup> 馮桂芬，〈馬中書傳〉、〈劉觀察傳〉，《顯志堂稿》卷 6。

桂芬早對此不公平的課賦，極感不滿。因此，桂芬乃聯合友人陳時，向蘇州巡撫許乃釗、知府喬松年請命，實行大小戶均賦。蘇撫許乃釗本已答應，後因大戶聯合極力反對，行之未久，便告中斷，職是之故，桂芬對許之所為，甚不諒解。<sup>27</sup>

由於上述各項功績，江蘇巡撫吉爾杭阿，於咸豐 6 年保奏，賜桂芬五品銜，升任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正準備北上赴京就職，復因受流言中傷而暫止，經辯白後，於咸豐 8 年，方得入京就職。但一年後，又因得罪權貴，引疾而歸。適值其同年進士，且為研究算學之至友徐有壬，升江蘇巡撫駐蘇州，於是桂芬又以大小戶均賦進說，但徐氏知其行之不易，未應允，桂芬失望之餘，從此不談政治，絕意仕途，閉門不與外事，而時已 50 矣！<sup>28</sup>

翌年春間，桂芬隱棲蘇州城郊十里外之鄧蔚山麓，移藏書萬卷，貸屋一幢，準備長期隱居，逍遙林間，耽於讀書三昧，從事著述。不幸的是，未幾向榮的江南大營覆沒，太平軍橫掃江、浙兩省，江南除了上海、鎮江外，全部淪陷。不得已，桂芬棄家逃難，輾轉播遷，於是年 11 月間，舉家卜居上海，自是以後數年，桂芬一直居留滬上，直至同治 2 年 10 月，官軍克復蘇州後，始再返回故里。在滬三年中，桂芬基於知識份子的使命感，又做了不少事。咸豐 11 年 7 月，太平軍李秀成率部進逼上海，彼時上海防衛薄弱，官兵勢不能支，不得不求於外力。於是桂芬乃糾集潘曾章、顧文彬、吳雲等蘇州鄉紳，成立會防局，極力倡言放棄鄙視外人之成見，而謀共同協力抗敵，其後更拉攏外國兵力和李鴻章所率的部隊合作，桂芬從中交涉，居功至偉。

<sup>27</sup> 馮桂芬，〈與許撫部書〉，《顯志堂稿》卷 5；〈陳君若木傳〉，《顯志堂稿》卷 6。

<sup>28</sup> 馮桂芬，〈復許滇生師書〉，《顯志堂稿》卷 5；〈卓公神道碑〉，《顯志堂稿》卷 7。

於此同時，桂芬又聯合蘇州鄉紳，向安慶曾國藩乞師，此舉影響更大，而曾氏之所以答應，桂芬所撰之公啟，也起了不少作用。難怪數年後，曾和桂芬在金陵見面，曾回溯此事對桂芬言：「東南大局，盡在君一紙書。」<sup>29</sup>頗服其才識，欲聘為幕府，桂芬辭謝。桂芬寓居上海期間，不僅為時局奔走，同時更主講於上海「敬業書院」，為「敬業書院」山長。<sup>30</sup>期間，李鴻章出師上海，兼撫江蘇，一再邀約入幕，桂芬因知李氏有改革江蘇田賦之才略和魄力，為實現其過去改革之志，乃應邀入幕。<sup>31</sup>在李氏幕府的這些年間，就其經世致用的抱負而言，是桂芬最有成就的一段時期。

同治 2 年，桂芬建議而為李氏採行之事業有二：一為江蘇減租；一為上海同文館之設立。同文館者，乃教授外國語文之學校，蓋桂芬前組會防局之際，每與外人交涉，深感通曉外國語言人材之重要，故向李建策，奏准後始實現。上海同文館的成立，對促進中國近代化，有著極大的貢獻與影響。由於桂芬卓越的表現，同治 3、4 年間，安徽巡撫喬松年和李鴻章均分別先後奏陳推舉，<sup>32</sup>但桂芬已決計不再就宦，乃辭去李鴻章幕府，回返故鄉，盡瘁鄉梓。除策劃修濬河道，修葺祠宇，復興善堂外，對蘇州府學、吳縣學、「蘇州貢院」、「正誼書院」等之重建，效力良多。此外，還長期講學「正誼書院」及任「紫陽書院」山長，作育英才，厥功至偉。<sup>33</sup>

同治 8 年，蘇州重修府志，桂芬被推為總纂。同治 9 年，李鴻章再行奏請，朝廷又予以晉加三品銜。<sup>34</sup>12 年，有人向朝廷建議恢

<sup>29</sup> 同註 11。

<sup>30</sup> 《同治上海縣志》卷 9，〈學校，正誼書院條〉；《民國上海縣志》卷 11，〈人物游寓〉。

<sup>31</sup> 馮桂芬，〈江蘇減賦記〉，《顯志堂稿》卷 5。

<sup>32</sup> 《李文忠公全書》，〈奏稿〉，9，〈附保馮桂芬片〉。

<sup>33</sup> 《同治蘇州府志》、《民國吳縣志》，〈學校，善堂條〉。

<sup>34</sup> 《李文忠公全書》，〈奏稿〉，16，〈馮桂芬請加三品銜〉。

復黃河故道，並修整運河，以備全面恢復漕糧河運。桂芬聞訊，特致函李鴻章，詳陳其弊，鴻章據以入奏，力持反對，議遂被擋置。<sup>35</sup>同治 13 年 4 月 13 日，桂芬卒於故里，年 66 歲。其一生著作甚多，於文字、算學、經世之學，無不精通。重要著作有《校邠廬抗議》2 卷和《顯志堂稿》12 卷，其中尤以《校邠廬抗議》一書，曾被王韜譽為「近來談西務者，當以此為左券」，<sup>36</sup>由此可見其重要性於一般了。

### 三、馮桂芬變法思想之時代背景

「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形勢，主客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虜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託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礟彈所到無所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又為千年來未有之強敵。……」<sup>37</sup>這是同治 13 年，李鴻章對中國的國際地位所作的觀察。

誠然，鴻章的觀察是有感而發的，原因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面臨了內外雙重的危急。發於內的是乾嘉以降吏治敗壞與道咸以來的太平軍、捻匪、回民連年的叛亂；來自國外的有硬把中國拖在背上而口呼『白種人負擔』的西洋傳教士及找尋市場推售貨品的外國商人。他們在本國政府堅利船砲的保護下，迫害中國的信仰，掠奪中國的財富。此一情勢到十九世紀的六十年代，發展到了極點。」<sup>38</sup>說

<sup>35</sup> 《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復馮景庭官允〉。

<sup>36</sup> 王韜，《瀛環雜誌》卷 4（臺北：文海版），頁 21-22。

<sup>37</sup>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同治 13 年）。

<sup>38</sup> 李恩涵等著，《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與自強運動》（臺北：食貨版），頁 90。

的更具體些，這種情況便是當時列強侵略中國的模式，鴉片戰爭後，少數識見遠大的知識份子，已注意到此是「千年未有之變局」。

英法諸國更遠非昔日蠻夷可比，主持查禁鴉片的林則徐便說：「彼之大砲遠及十里內外，若我砲不及彼，彼砲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砲如內地之放排槍，連聲不斷；我放一砲後，須輾轉移時再放一砲，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無他深巧耳！不此之務，即遠調百萬貔貅，恐祇供臨敵之一哄。沉逆船之朝南暮北，惟水師始能尾追，岸兵能頃刻移動否？蓋內地將弁兵丁，雖不乏久歷戎行之人，而皆覩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見面而接仗者，未之前聞。徐嘗謂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膽壯心齊是已。第一要大砲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講，真令岳韓束手，奈何！奈何！」。<sup>39</sup>

林則徐從其禁煙的實際經驗中，知道外人船堅砲利之可怕，但是言者諄諄，聽者邈邈，朝野仍舊在一種天朝意識的氣氛中自我陶醉，粉飾太平。視林則徐之言為荒誕不經的危言，道光及一般朝臣不僅不虛心檢討此次失敗的癥結何在？反而認為只是則徐措施的不當。而則徐的密友魏源，以其所聞及則徐賜與之材料，高瞻遠矚的撰寫成《海國圖誌》一書。其自序曾言該書之動機：「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而作』。」他認為：「知夷事必知夷情，知夷情必知夷形」。<sup>40</sup>魏源的看法，無疑的又比林則徐更深一層，他主張不僅要學習西洋物質文明，更要從國民心理方面做文化的根本改革。但不管則徐也好，魏源也罷，他們的精誠遠見，都在傳統守舊保守的勢力下，化為烏有，中國的現代化又延誤了二十年。

<sup>39</sup> 佚名，《潰靡流毒》卷 4，〈林少穆制府譴戍伊犁行次蘭州致姚春木、王冬壽書〉。

<sup>40</sup> 魏源，《海國圖誌》，〈自序〉。

郭廷以在〈近代西洋文化之輸入及其認識〉一文中，提到那時一般中國人的心態，「經過第一次的失敗（鴉片戰爭），一般人的心理甚少改變，尚不服輸，反加重憎恨。十五年間（1842～1856）毫無進步，接著又有第二次戰爭，即英法聯軍。這次的打擊太大了，廣州被佔了四年，大沽、天津兩度不守，勁旅如僧格林沁全軍覆沒，北京淪陷，皇室精華所在的圓明園變為瓦礫，皇帝逃亡到塞外熱河，滿清的政權眼看不保，所謂『根本重地，事機間不容髮』。創痛至深，危機至急，再不能不認輸了」。<sup>41</sup>

無可諱言，這次的戰敗，給中國朝野及知識份子莫大的刺激，一般朝中大臣如恭親王奕訢、文祥、及在外疆臣曾、李、左諸人，才開始覺悟到非自強無以強盛，非行洋務無以自強。「而朝野普遍激起的這股奮發之氣，自強思想，至此而滙成思想主流，形成一種運動。提倡西學，注重洋務，開始對西洋作廣泛的認識與研究；從格致之學，到工業建設，認定為西洋致富強的本源，從而接收與仿效」。<sup>42</sup>

雖說朝野已有所反應，可是這些覺悟之士，畢竟仍屬少數，守舊的勢力仍是很大。如當時守舊士大夫的代表人物大學士倭仁，便曾極力反對，他曾上疏皇帝道：「竊聞立國之道，尚禮儀，不尚權謀；根本之道，在人心，不在技藝。今求之一藝之末，而又奉夷人為師，無論夷人詭譎，未必得其精巧；既使教者誠教，學者誠學，所成就者不過術數之士，古往今來未聞有恃術數而能起衰振弱者也」。<sup>43</sup>

倭仁這種昧於時勢，不識大體的短視，在那時卻是被認為「至理名言」，不僅士大夫如是，廣大的中國人均如此。對自強運動的

<sup>41</sup> 郭廷以，〈近代西洋文化之輸入及其認識〉，《中國現代化的歷程》（臺北：時報版），頁 159。

<sup>42</sup> 王爾敏，〈清季維新人物的託古改制論〉，見其著，《晚清政治思想史論》（臺北：華世版），頁 31。

<sup>43</sup>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 48。

各項建設，不是反對，便是掣肘，種種迷信怪論，如說電桿是「平地生疔」、築鐵路會「破壞風水」、置電線將「影響地脈」，這種現象，對實行自強運動，無疑是一大阻力。莫怪乎！李鴻章十分感慨的說：「鴻章竊以為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中土士大夫沈浸於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蠶而不加細心，以致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sup>44</sup>「士大夫囿於章句之學，而昧於數千年來一大變局，狃於目前苟安，而遂忘於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創鉅而痛深……」。<sup>45</sup>

鴻章此言真是一針見血之論，但是除了士大夫的守舊和民眾的迷信外，清朝政治制度的不足以因應時勢，才是最大的關鍵。當時的中國社會，政制還是完全停滯在中古時代，腐敗、落伍、專制。這一點，領導自強運動的諸公沒有看出；而同時代，前進的知識份子馮桂芬卻看出了。遺憾的是，桂芬所看出的那個古老、保守、愚昧的中國社會，卻是他亟思改變而又力不從心的時代背景。

#### 四、馮桂芬變法思想之起源

晚清變法思想，就其內容而言，可謂一「新思想」，而這一股新思想，其動力源自何處？要以言之，是來自傳統儒學的經世思想。咸同時期的知識份子，如魏源、馮桂芬、王韜，均出自傳統的儒家思想。有不少外人批評自強運動之所以失敗，是儒家思想無法適應現代的政治體制上。如 Mary C. Wright 女士在其大著《同治中興》一書中便說：「同治中興的失敗，顯示一項難得的澄清，即是甚至在最有利的環境中，仍然沒有途徑，可以將有效的現代國家，接植於

<sup>44</sup>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 25。

<sup>45</sup> 《李文忠公全集》卷 19，〈奏稿〉。

一個儒家社會之上」。<sup>46</sup>此種看法，我以為有失偏頗。吾人即以馮桂芬為例，來看這個問題及其思想，便可略知端倪。談起馮氏思想的淵源，可歸納三點言之：

### (一) 傳統儒家的經世思想

王爾敏在〈經世思想之義界問題〉一文中提到：「儒家自孔子始首重行為實踐，是故不尚空言。……後世漢儒以傳經為正宗，宋儒以窮理為本業。均已與孔子相去懸遠。欲還其舊觀，惟經世最具實踐意義，而『通經致用』一語，即為儒家經世重要原則」。<sup>47</sup>換言之，「經世」辭旨，乃是「經國濟世」之意，亦即儒家所謂「學優則仕」的入世之學。梁任公曾說：「莊生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凡學焉而不足為經世之用者，皆謂之俗學可也。』居今日而言經世，與唐宋以來之言經世者又稍異。必深通六經制作之精意，證以周秦諸子及西人公理公法之書以為之經，以求治天下之理」。<sup>48</sup>

觀任公這段話，在和桂芬的思想對照，我們不禁覺得十分吻合。「經世乃儒生入世為政宗旨，志在治天下於太平，登萬民於席衽。必定力求革除弊政，創籌良策。但凡經世思想家，雖守六經典制，而必識世變之乘。各當不同時會，不同難題，思考適應治術，進求改革」。<sup>49</sup>桂芬的《校邠廬抗議》一書，便是上述這段話最好的註腳。桂芬對儒家所言的「因革損益」，曾有如下的見解：「然則為治者將曠然大變，一切復古乎？曰：不可。古今異時亦異勢，論語稱損益；

<sup>46</sup> Mary C.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臺北：虹橋版)。

<sup>47</sup> 王爾敏，〈經世思想之義界問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3 期，頁 36。

<sup>48</sup>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卷 2 (臺北：中華版)，頁 28。

<sup>49</sup> 同註 47，頁 36。